



1894 - 1994

国 际 奥 林 匹 克 委 员 会 一 百 年
思 想 - 主 席 - 成 就

第 一 卷

特别鸣谢

此书在印制过程中得到了青岛啤酒
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1894—1994—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00年

编 著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中文版编译 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

印 装 深圳市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8 印张 125.5

非卖品（精装全套三卷）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一百年





1894 - 1994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 ONE HUNDRED YEARS
The Idea - The Presidents - The Achievements

Work in three volumes

Series produc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Raymond Gafner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L Y M P I C C O M M I T T E E

LAUSANNE 1994



1894 - 1994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一百年
思想 - 主席 - 成就

三卷集

出版负责人 雷蒙德·加夫纳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1894 - 1994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 ONE HUNDRED YEARS

The Idea - The Presidents - The Achievements

I

The presidencies of

Demetrius Vikelas

(1894-1896)

and

Pierre de Coubertin

(1896-1925)

by Yves-Pierre Bouloungne

...

The presidency of

Henri de Baillet-Latour

(1925-1942)

by Karl Lennartz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L Y M P I C C O M M I T T E E

LAUSANNE 1994



1894 - 1994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一百年 思想 - 主席 - 成就

德米特留斯·维凯拉斯

(1894—1896)

与

皮埃尔·德·顾拜旦

(1896—1925)

担任主席期间

作者 伊夫·皮埃尔·布伦

...

亨利·德·巴耶-拉普尔

(1925—1942)

担任主席期间

作者 卡尔·伦纳茨

国 际 奥 林 匹 克 委 员 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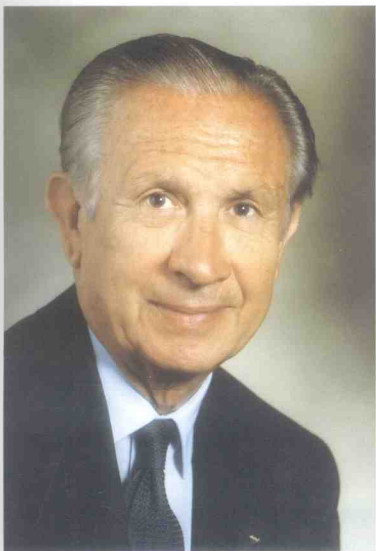
洛桑 1994年



1894-1994—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00年
思想-主席-成就

第一卷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994年版
保留文字及图片的一切复制版权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非常愉快地献上它的《百周年之书》这第一本专门写它本身历史的书。1894年6月23日在巴黎的索邦，皮尔·德·顾拜旦男爵建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来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奥运会于1896年在奥林匹克主义的“故乡”雅典举行。

这个将体育与文化、体育运动与艺术联结在一起的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是如何发展的？这就是本书的主题。这本书复述了奥林匹克运动从它的起源直到今天的历史。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故事，经常和熟练地被传说。关于它的媒介报道，随着每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展传递给了亿万人。但是有了这本《百周年之书》，这座冰山的隐藏部分终于显现出来。书中阐述了在一个世纪、而且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纪里进行过的全部战斗，进行斗争的人满怀激情要看到他们追求的和平、兄弟情谊与团结的理想取得胜利。我甚至想说是“重生”在永恒的现在里。我们将更好地了解奥林匹克运动如何征服了世界，就像它旗帜上五环所象征的那样。从一届主席的任期到另一届，就像接力赛跑那样，领导人在过去年月里不引人注目地工作，他们就身地忙碌于各个委员会、研究小组和国际奥委会创立的行政机构里，现在终于能为人们所知晓。这得感谢大学学者和研究员的努力，他们的客观性值得表扬。

我们对这本书很自豪，它对奥林匹克主义作了生动的描写，描写了它确曾建立在日常生活的世界里。

我想特别感谢我们的同事、国际奥委会名誉委员和行政总管雷蒙德·加夫纳在这整个计划中的有效协调。这本书当然是献给391个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从为我们造成了今天这一切的比埃尔·德·顾拜旦开始。

1994 Juan Antonio Samaranch
Pr C10

国际奥委会主席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1994年

中 文 版 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创建于 1894 年。至 1994 年，它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不少创建于十九世纪末的国际组织至今已销声匿迹，而国际奥委会虽几经磨难，却能从危机中重新奋起，今天它正如日中天，它所领导的奥林匹克运动已发展成当今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为了纪念这一不平常的历程，国际奥委会于 1994 年出版了《国际奥委会一百年》。经国际奥委会 103 次全体委员会授权，奥林匹克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描述国际奥委会百年史的中文版。

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主席对《国际奥委会一百年》中文版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没有他的支持，这本三卷巨著中文版的出版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他的信任，他授权我根据我的了解，全权审核书中有关中国的章节并作出更符合历史真实的改动。

国际奥委员会及它所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才逐渐被中国所认识的。从那时起，中国的体育组织与之建立了联系，迄今已七十余年。在这期间，世界经历了巨变，中国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些历史的变动中，中国和国际奥委会之间的关系曾一度经历了曲折。如今雨过天霁，进入了双方融洽的合作阶段。奥林匹克运动近年在中国已深入人心。今天，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于从更深的层次认识奥林匹克运动，了解它的过去，探索它的未来。相信《国际奥委会一百年》中文版这部巨著的出版，将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

萨马兰奇

雷蒙德·加夫纳

国际奥委会名誉委员和行政总管

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奇

在本书首页强调指出，国际奥委会先后共有 391 名成员。国际奥委会的百年历史首先就是这些男性及新近加入它的女性的历史，这些人的出身、社会背景、职业和个人秉性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优劣智慧。尽管已有许许多多的书籍、研究课题和报告将国际奥委会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其中不乏出类拔萃之作，然而人们却从未能充分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国际奥委会的历史进行过系统研究。这些资料包括作者们在其文后开列的参考文献和国际奥委会储藏丰富的档案馆里与日俱增的资料，尤其是创建于 1921 年的国际奥委会执行局至今依然保密的会议记录。

所以，1990 年国际奥委会主席指定了一个研究小组，来完成这一新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即编辑国际奥委会百周年的历史。全书为三卷，第一卷定于 1994 年 6 月 23 日，即庆祝国际奥委会在巴黎索邦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出版。

研究小组由下列人士组成：

- 伊夫·皮埃尔·布伦 (Yves-pierre Bouloungne) 教授 (法国)
- 弗尔南·朗德里 (Fernand Landry) 博士、教授 (加拿大)
- 卡尔·伦纳茨 (Karl Lennartz) 博士 (德国)
- 奥托·尚茨 (Otto Schantz) 教授 (法国)
- 马德琳·耶勒斯 (Magdeleine Yerles) 博士、副教授 (加拿大)
- 诺伯特·穆勒 (Norbert Muller) 教授 (德国)，学术协调人

在着手开始这项工作，该小组为自己确定的主要目标是：

- 以高水平的历史表述为基础，在一个全球化发展变化的时空框架中去确定奥林匹克机构的位置。
- 写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科学著作。

然而，任何著作都会有其局限。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它不可能面面俱到。许多文献，尽管作者小心在意，仍然未切中要害。另一些则不过只是做到了部分清晰。任何一个使用或参考过会议记录的人都知道，有时这些记录遗漏的其它实际包含的内容一样多。如果不去涉及其内幕及有关的人物，不去勾勒出各事件发生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这

个机构的历史是不会完整的。

因此，我要向研究小组的成员表示由衷的感谢。四年来，在这个由我领导的小组里，我目睹了他们在锲而不舍、充满激情、科学地而又独具匠心地工作着。虽然他们的个人背景各有不同，但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成功的渴望和合作精神。我认为应该在这里加以赞扬才是公平合理的。为了加快研究进程，小组的部分成员邀请了他们的一些同事对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偶然提供了他们的宝贵意见，对此我们非常感激。

我还要提到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经常分配到一些得不到感谢的任务，全身心地投入大量而繁杂的工作，贡献出自己的专长。他们奉献了许多，同时，也确实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应该提到的有下面这些人：帕特里斯·肖莱、贝蒂·吉尼亚尔、米歇尔·艾拉沙巴尔、米凯莱·韦亚尔和卡尔·文德尔。

应感谢的还有我们的合作者和伙伴——洛桑联合印刷厂 (Reunies) 的印刷、制图专家们，是他们使这一著作最终得以完成。

最后，如果不强调一下翻译工作者对此项工作的巨大贡献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支翻译工作者队伍，不论是属于由尚塔尔·杰姆利负责的国际奥委会自己的班子，还是来自外界的工作人员，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本书是以法语和英语这两种国际奥委会的工作语言出版的，但大部分的原稿却是用德文写的。我们十分感谢国际奥委会翻译部的鲁思·格里菲斯，她以自己杰出的才能和令人满意的效率，完成并检查了几乎全部的由法语和德语到英语的翻译工作。我相信英语版本的读者会感谢她的努力。

按照国际奥委会与研究小组协议的最初计划，本书的前两卷是四个作者写的文稿，而第三卷包括了涉及国际奥委会生活各方面的引人入胜的附件。这三卷书要同时出版。

这一计划在相当晚的时候，即 1994 年初，不得不有所变动。由于 1993 年 12 月负责 1972—1994 年时期编写工作的朗德里教授突然重病，做了一次大手术，原定的写作期他仍然处于术后的漫长恢复期阶段。于是三卷在 1994 年夏天同时出版的原定计划无法实现。

为了使本书能在其最适宜的时机，即国际奥委会成立100周年庆典之际出版，决定在1994年夏天出版前两卷，而将1972—1994年部分调到第三卷，该卷于1994—1995年冬季出版。

第二卷描述的时期是1942—1952年（伦纳茨博士）和1952—1972年（尚茨教授），第三卷描述的则是1972—1994年时期（朗德里教授和耶勒斯教授）。

为了避免附件的不应有的延迟出版，我们将其分置于三卷中，于是，与前两卷讨论内容有关的附件随这两卷同时出版。

幸运的是，朗德里教授从一开始就得到有特别专长的伙伴马德琳·耶勒斯教授的协助。耶勒斯教授以其果断和我们十分感激的团队精神，修订了自己的计划，以便使她的历史知识和才能更全部地为国际奥委会服务。我们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做好了准备，一旦需要，就协助她，以便使朗德里教授在其同事的支持下完成交给他的任务。

这一意外的事故，仅有的积极一面是使朗德里教授得以将其研究延伸到1994年6月23日这一关键性的日子。此外，萨马兰奇主席，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此充实他将在1994年巴黎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上讨论时的最后发言。

尽管研究小组成员之间增多了交流，但是由五个不同的作者来做同一课题，自然会产生一些微妙的问题。

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尊重每一作者对自己负责部分文稿的自由，而且，也要考虑到研究这段历史时学者们持有不同的历史感。

当然，我们的工作是要写出国际奥委会百周年的历史，国际奥委会7位主席的历史并非我们的主要目标。

但是，由于每一个主席的个人特点在其处理事情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种历史之间又怎能保持一条清晰的界限呢？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国际奥委会的初创时期。当时顾

拜旦往往单枪匹马、遭人误解、逆流而上。他构想创造保持、捍卫和发展了后来成为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的东西。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顾拜旦克服了种种困难，将他的这一工作坚持了下来。在最初的岁月中，百事待立，一定程度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国际奥委会以一个初具形态的组织，既无财政来源，又无行政支持，却生存了下来，这要归功于顾拜旦的有预见的决心和全身心的投入，尽管他身上兼有优点和缺点。

因此，必须将工作与工作者紧紧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描绘出这一初创时期。

布伦教授阐明此理，他试图追随顾拜旦的足迹，有时甚至将自己假定为顾拜旦或站在顾拜旦的立场上，从内部去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以便向人们最清楚地展示出一个真正的顾拜旦。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无论对作者或是他所研究的对象都是非常适宜的。他跳出窠臼，生动地再现了国际奥委会坎坷的少年时期，描述了在这整个过程中顾拜旦像个“童子军”（顾拜旦的原话）那样探索自己的事业。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每一个时期都有着自己的风格。自从1925年顾拜旦离开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岗位以来，奥林匹克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国际奥委会有了执行局这种形式的“政府”机构。

1921年在顾拜旦不太热心的同意下，成立了国际奥委会执行局，由葛德弗莱·德·布洛奈主持（顾拜旦本人无意任此职）。事实很快证明，执行局的设立是一个成功之举。随着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事业的辉煌进程，国际奥委会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机构，可以缓慢地发展为一个有结构的组织，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延续性、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与其天然伙伴（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建立持久的关系。而这些在以前不过只是设想而已。

卡尔·伦纳茨博士出色地把握住了国际奥委会内部在1925—1942年期间的成熟过程。这一期间，即巴耶-拉图尔的任期，也正是他在本书第一卷中要描述的。他用一个研究者精确、严密、十分可靠的头脑和大量的资料，深入地研究了这一时期国际奥委会的曲折历史。以及与政治日益加剧的冲突。

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两位作者并肩工作，在各自的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思想开放和相互尊重，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始终激励着我们。这也正是国际奥委会百周年之际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最可贵的价值所在。

我们是否达到国际奥委会为我们确定的目标，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只有留待读者自己来告诉我们。

然而，这一工作已然向我们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国际奥委会及其天然伙伴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社会力量，它是否能成功地保持这种状况？它的影响是否会进一步增长？为达此目的，它是否充分地利用穿插其历史过程中所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最后，它要达到自己目标的最基本的手段将是什么？

在我看来，它的制胜之道是在于它服务于人类社会时用来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性、独创性和有效性的那种力量。

在我们这个无助的世界上，环环紧扣的奥林匹克五环象征如果真正辐射出信念与希望之光，它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

这只是一些空洞的大话吗？也许如此。但要证明它并非如此也完全取决于我们。

在萨马兰奇主席提到的 391 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中，我所熟悉者超过半数。对于我来说，这个奥林匹克世纪后半期的历史是与这些熟人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他们铭记在我的脑海里，我在 1994 年 3 月刊的《奥林匹克评论》中写道：

“由于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一个人可以从自己周围的人们那里得到有效的帮助而超越自我，即使这种状况仅仅发生在一些特定的时刻。在某些情况下，一个集会会比它包容的各个个人的总和更可宝贵。在一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群体中，个人更易发挥出超越自身的价值。在国际奥委会中，我曾有好几次机会看到这一点。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誓词可能与此并非无关。

“从一开始，国际奥委会就试图激起其成员的热望，同时也在为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中超越自我。去理解每一个人类社会有着各自的弱点与缺点。顾拜旦为了保持和获益于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增选委员制度，进行了持续

不懈的斗争。他坚持国际奥委会的成员是在各自的国家和体育组织中国际奥委会的代表，而不是相反。

“在国际奥委会创立之时，顾拜旦就毫不犹豫地从事类似的组织，包括亨莱划船大赛委员会样板中得到启示。这种逆向代表制为他所欣赏。今天我们应当考虑，是否应让我们的政策体现出更加开放的方式，在对持续性的考虑和对演进性的意愿之间达到一种富于生气的平衡。

“为达此目的，国际奥委会应当毫不迟疑地使自己的组织结构适应于今日的社会环境，寻求一种成员的遴选机制。使增选委员制的优点与奥林匹克运动中其他力量的代表的优势融为一体。”

关于对持续性的考虑和对演进性的意愿包括：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政策的第一步都在本书中有所记录。奥林匹克世界是否知道将如何从中得到启迪？对此虽然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确知，已有一个世纪之久的企盼成功的意愿。这种意愿是否强烈到足以在未来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对已经消逝的过去的理解可以有助于国际奥委会的下一代做出答案。

业余体育联合会	AAA	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
业余体育俱乐部	AAC	Amateur Athletic Club
业余体育联盟	AAU	Amateur Athletic Union
执行局	EB	Executive Board
执行委员会	EC	Executive Committee
国际足球联合会 (国际足联)	FIF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Federation)
国际体操联合会 (国际体操联)	FIG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Gymnastique (International Gymnastic Federation)
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 (国际泳联)	FIN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Amateur (International Amateur Swimming Federation)
国际滑雪联合会 (国际滑雪联)	FIS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Ski (International Ski Federation)
国际赛艇联合会 (国际赛艇联)	FIS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Sociétés d'Aviron (International Rowing Federation)
国际妇女体育联合会 (国际妇女体联)	FSFI	Fédération Sportive Féminine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 Women's Sport Federation)
法国妇女体育运动协会联合会 (法国妇女体协联)	FSFSF	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Féminines Sportives de France (Federation of French Women's Sports Clubs)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I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国际草地网球联合会 (国际草地网联)	ILTF	International Lawn Tennis Federation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奥委会)	IOC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国际滑冰联盟 (国际滑冰联)	ISU	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
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	NOC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国社党)	NSDAP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法国体育运动协会联合会 (法国体协联)	USFSA	Union des Sociétés Françaises de Sports Athlétiques (Union of French Athletic Sports Clubs)
基督教青年会 (青年会)	YMC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德米特留斯·维凯拉斯
(1894—1896)

与

皮埃尔·德·顾拜旦
(1896—1925)
担任主席期间

作者 伊夫·皮埃尔·布伦
法国克雷泰伊，瓦尔·德·马恩，巴黎
大学名誉教授
教育科学培养与研究部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1.1894 年到 1925 年

1.1.19 世纪末的西欧

18 世纪后期，从苏格兰开始的经济变革很快风靡了以农业为传统的整个欧洲。

工业革命引发了新的生产方式，为文明开辟了新的前景，并导致了新的政策。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1789 年大革命掀起的文化冲击的大潮，开始深入到经济领域。其时，科学正待为进步开辟新的道路，国际贸易即将为和平铺平道路。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对人类及其相关联的国家所能取得的成就有所限制。

由于根基被拔而激起的愤怒充满了各古老的农业国度。在凄惨的棚屋和肮脏的庭院里挤满了无法挣脱矿山或工厂主桎梏的无产者。这些骨瘦如柴，但却坚定的无产者被马克思用来作为其唯物社会主义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标记。

科学技术的进步正要将这些被剥削的农民——工人变为现代的开创者。激烈变革的时期常常伴随着这类悲剧性的社会残暴。

一个壮阔的历史场景正在被拉开。欧洲正领导着一个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十字军进军。这场进军的前进与倒退、征服与“武装的和平”将在这个星球留下抹煞不掉的痕迹。工业化的浪潮首先席卷了英格兰及其帝国，熔铸成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继而横扫欧洲大陆。日本、亚洲、非洲和大洋洲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1911 年，欧洲是无可争议的世界贸易领导者，而大英帝国则是主要的殖民和贸易强国。欧洲的经济、文学和文化是无与伦比的。在法国，初等教育是世俗的和强制性的，在各地普及开来，并获得程度不

同的成功。突然之间，为了操作机器，阅读和写字成为必要条件。这不仅是对人类尊严的启迪，也是启蒙运动时代提出的要求。而中等教育，仍为少数特权阶层所保留。但是，在古典人文主义的支持者、“老家伙”们和主张教育民主化，使教育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的下层中产阶级的“后来者”之间，逐渐出现了一种相互对立的局面。

进步不是均等的。由于在经济和工业发展、主导习俗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各国之间存在着差异。英国的中等教育力图培养年青的企业家头脑，通过国民合作的多种形式——社团性的或慈善性的——将青年人联系起来，其中体育运动起着重要作用。而法国的中学，却因无法摆脱拿破仑的桎梏而一片灰暗。作为普鲁士传统的继承者，德国的“体操馆”很快就为科学和技术敞开了大门。成人教育和全民教育很快成为当时的制度，工会、教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等加快了 this 进程。夜校和图书馆在各处开设。在社会这种高涨的热情中，知识分子向群众靠拢。在 19 世纪后期，欧洲的知识界既慷慨大方又满是乌托邦的空想。其时，欧洲十分强大，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旧大陆领导着整个世界。

然而，这种力量的基础却是脆弱的。欧洲人口和文化的多样性，虚浮的富足和魅力，使这一大陆极易感染悲剧性的民族主义病害。盎格鲁——日尔曼冲突与传统法兰克——日尔曼矛盾一脉相承；巴尔干地区的局势由于俄国泛斯拉夫的扩张而变得极为复杂。在非洲，殖民主义征服者们煽起了暴力的烈焰；在欧洲陈旧破烂的外衣上出现了“武装和平”的字样。一系